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美国大战略

〔美〕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著

郭树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2013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美国大战略

（2007—2013年）

（2007—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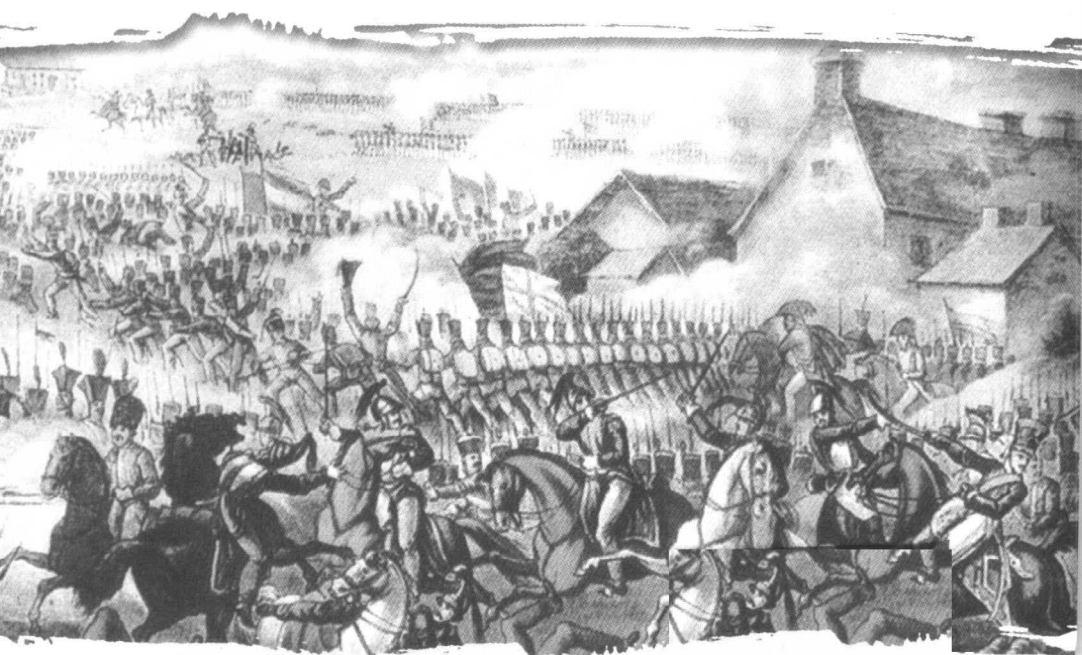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美国大战略

〔美〕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著
郭树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13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战略/(美)阿特著;郭树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7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7-301-09109-5

I. 美… II. ①阿… ②郭… III. 发展战略-研究-美国
IV. D77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8706号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By Robert J. Ar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3 by The Century Foundation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美国大战略

著作责任者: [美]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 著 郭树勇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109-5/D·12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75印张 377千字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6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 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而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

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望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 序

美国大战略的理论图景与历史逻辑

翻译一本理论色彩较浓的著作,总要写一篇译序,似乎已经成为翻译界的惯例。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耿协峰编辑与中央党校的门洪华先生几次催我把译序写出来。为《美国大战略》(*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写译序,对我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说它有困难,是因为我虽然在军队时曾从事过战略学的教学研究,但基本的学术训练是国际关系理论,即使在翻译方面能够过关,也难以从战略学的理论高度上对于一部有一定战略学知识背景的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深入评介。阿特先生在该书导论部分,已言简意赅地完整勾画出了研究宗旨、逻辑起点、基本方法、宏观框架及国策建议。在这里我只想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谈一下我翻译中的体会。与广大读者共勉。

这本书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禁不住一气呵成而竟全书,因为我们难得读到主题凝重却亦庄亦谐、视野宏大而思路清晰、道理深邃却个案丰富、微言大义而语言流畅、谈古论今又数据准确、已见鲜明而兼收并蓄、洋洋数十万言而自成一体的战略学著作。我的译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一下本书作者阿特教授与本书的主要观点。然后,主要分析成书背景与本书宗旨。接着重点考察阿特教授在本书中的理论与历史方法。最后谈一谈阿特眼中的美国大战略与中国崛起的关系。

一、著者介绍与主要观点

(一) 著者介绍

罗伯特·阿特是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敖脱(Christian A. Herter)国际关系学教授,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国际安全研究专家,也是闻名于国际战略学界的杰出学者。作为国际关系学家,他的名字常常与塞约姆·布朗(Seyom Brown)、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等联系在一起;作为安全研究专家,他的名字常常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等杂志联系在一起;作为战略学家,他的名字常常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战略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联系在一起。《美国大战略》一书体现了他三种学术身份的综合,阿特教授凭借他三种学科交叉的背景,以学术综合的独特优势,写出了这本水平上被认为纯粹的国际关系学家、安全专家或者战略学家都难以企及的大战略著作。

1967年,阿特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从此踏上了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学术道路。他的学术踪影穿梭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斯代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著名高校之间。他先是像亨廷顿那样在哈佛大学的奥林战略所供职,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还是麻省理工学院21世纪项目研讨班的主任。他曾经担任过布兰代斯大学人文科学院研究生学院的院长。目前同时担任美国几家最重要的安全类杂志的编委,如《国际安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安全研究》以及《战略研究杂志》。他还是康奈尔大学安全研究丛书的联合主编、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目前,他在布兰代斯大学里教授国际关系学,其专业方向是国家安全事务与美国外交政策。

阿特教授与美国军方曾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阿特担任美国国防部远程计划参谋秘书。这段经历使他了解了美国国防部的内幕,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其自身的安全研究背景与新的学术兴趣一拍即合。在很长的时间内,阿特教授专注于军事决策机制及其改革,希望以此为切入点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军事力量发挥外交作用。他曾出版专著《TFX决策:麦克纳马拉和军队》(*The TFX Decision: McNamara and the Military*),并与美

国著名战略学家和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文森特·戴维斯(Vincent Davis)共同主编了《重组美国国防》(*Reorganizing America's Defense*)。他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实力主义的色彩。比如,他与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塞约姆·布朗合作出版了《美国外交政策:谋求新角色》(*U. 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a New Role*),与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帕特里克·克罗宁共同主编了《美国与恐吓外交》(*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本书是阿特教授独立完成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

(二)《美国大战略》的主要观点

1. 美国面临着国际形势五大特点

要美国拿出一项大战略,必须先要研究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找出那些能够对美国安全、繁荣与公民生活质量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当代国际环境的特点。阿特认为,国际环境有5个突出特点^①:第一,当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势均力敌,对美国本土构成压倒性的直接军事威胁。第二,大规模恐怖主义正在兴起,一个跨国宗教恐怖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基地”组织代表了一种新式的恐怖主义,它具有宗教动机,组织上高度集中并富有效率,拥有高尖技术,在使用暴力上不受约束,蓄意进行报复和惩罚性攻击,招募成员不分国籍,作战范围面向全球。第三,经济开放度与相互依赖出现了新的增长,世界富强的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且将其他国家逐渐而稳步地纳入这个相互依赖区中。第四,民主在民主大国中地位似乎十分稳固,从第一世界扩展到第三世界,民主不仅带来了政治自由,也带来了经济进步。第五,全球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

2. 美国当前有六项重要国家利益

战略学家的共识是:“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研究大战略的人有必要找出那些与国家安全特别有关的利益。”^②阿特也把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工作。^③阿特在美国国家利益分析上有其独到之处。他设定了3个分析标准,即“利益受到保护有多少收益,利益未受保护有多大的损失;实现这些利益后有什么

^① 见本书第一章。

^② 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③ 见本书第44页。

样的后果;运用何种方式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利益”。根据这个标准,阿特给各种重要的国家利益排出了顺序,并对各种利益在“9·11”事件后面面临的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找出运用军事手段实现这些利益的方法。在阿特看来,生死攸关利益是根本的利益,如果不能实现这项利益,就会带来灾难性或者近似灾难性的损失。高度重要利益是指那些实现后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若不能实现会造成不至于灾难性却是严重性损失的利益。重要利益是这样的一种利益,它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并可能增强国家安全,总体上能够改善国际环境,使之更适合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它的潜在价值或潜在损失都不是很大。不同的利益排序,对于美国军事手段的使用有着直接的意义。美国军事力量能够直接促进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但是它只能间接地促进重要利益。他反对为了一些“重要利益”动辄用武的做法,指出只是在“生死攸关和高度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才有必要使用武力。

3. 军事在大战略中占据主要地位

大战略是比单纯的军事战略更为宏大的战略领域,军事手段往往辅助经济、心理、外交等手段,大战略不是为了胜利而胜利,而是要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政治目标与和平政策。目前对于大战略至少有两种界定。第一种定义认为,大战略应当是超越军事手段的国家综合战略,是高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诸类战略之上的总体长远战略,这是一种对大战略较为宽泛的理解,虽然欧美学者都常有使用,但在东方社会尤为明显,目前中国学者大多采取这种定义方法^①;另一种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大战略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军事战略之上还有更高级的战略,战争中除军事手段之外还有非军事手段,战略家的视线应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大战略主要是一种战争期间的战略模式。^②阿特教授侧重于后一种定义,只不过他认为大战略不但可以用于战时,也可用于平时。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阿特教授的大战略概念作为第三种定义方法。他把大战略主要视为运用军事工具实现外交综合目标的战略,简言之就是“外交政策目标加军事战略”。

^①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国强民’的战略。”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具体地讲,大战略“集中关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军事工具使用方法。大战略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①。

4. 选择性干预战略是美国现在最好的大战略选择

目前美国战略界经常讨论且有可能实施的大战略模式一般指以下八种:即霸权战略、全球集体安全战略、地区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以及选择性干预战略。在作者看来选择性干预战略设定了一系列在当前时期最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基本目标,将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对美国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地区,维持前沿配置的防御部署,并对发动战争的时机规定了一套明智的规则,而且主张美国领导世界,被阿特认为是综合了其他各种大战略优点的战略选择。

5. 实施美国大战略的主要措施

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实施,需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式的战略准备。具体地讲,美国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军事准备,从七个方面进行政治准备。从军事上讲,美国必须拥有一支数量庞大、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技术先进并且诸兵种合成的军事力量;美国要把实施本土防御作为首要任务,防止大规模恐怖袭击,依靠导弹防御对付拥有核洲际弹道导弹的不友好国家;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对由核生化武器武装起来的恐怖主义集团或者那些因谋求这类武器而出名的组织采取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国应当继续在和平时期保持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需要将强大而多样化的武装力量的15%—20%部署在海外。

从政治上讲,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是选择性干预战略的两个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另外,美国还必须进一步锁定原苏联不安全的可裂变材料和生化武器,建设性地使用那些在这些领域有一技之长的科学家;进一步保护能源,特别是减轻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继续鼓励欧洲努力打造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并加强其防卫能力尤其是向欧洲外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努力消除国内不平等和国外资本的贪得无厌,防止当前反全球化力量破坏国际经济的开放性;美国不能允许反恐运动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设计出针对关键地区政治不满者的

^① 见本书第2页。

有效政策,削弱有全球影响的恐怖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二、“美国问题”^①与大战略的需求

主义皆为问题而生,问题皆为主义而备。问题性是国际关系与战略学理论的生成点。^② 一个世纪之前,罗素教授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中国问题》,其实任何大国都有其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面对国际政治中的转折性变化,当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学界中任何大文章,需要回答的美国问题是:“9·11”事件后,美国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与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冷战胜利之后,美国怎么办”、“霸权之后,美国怎么办”共同构成了当今美国对外交往的三大问题。三大问题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既与当前时段的国际形势空间分布有关,又与美国发展的不同时段历程有关。虽然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现在时,但是“冷战胜利之后,美国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起点在过去,“9·11后,美国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起点在现在,“霸权之后,美国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起点在将来。

围绕这三个问题,当代美国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以及战略学界的头面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各种外交战略,如超越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先发制人战略,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主义与理论,如历史终结论、单极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战争过时论、新帝国主义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好生热闹。美国学界的这种热中有冷、闹而不乱的主义之争,既显示出美国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与严重性,也透露出美国战略界的忧患意识。正是对于美国问题的悲观情绪,才能爆出战略大手笔。

对于“冷战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美国的思想界与战略界总体上持一种冷静的态度,以忧患的意识,拿我们常说的战略眼光看待美国

① “美国问题”有几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美国本身成了世界的问题,如法国国际政治学家托德认为,“对于世界而言,美国正变成一个‘问题’”。见埃曼纽·托德:《美帝国的衰落》(李旦、徐慧、李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美国已经变成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的用法主要指美国本身要确保在世界的领袖地位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② 关于问题性(problematique)的说法,较为著名的使用者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科克斯,他在其代表作《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理论的问题性,见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1页;国内学者也多次论述过问题与主义的内在联系,最近的论述包括秦亚青:《问题性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见2004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系编:《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论文集》。

的未来。冷战胜利之后,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威胁在哪里?说到底,就是找出美国世界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威胁。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人大致有六种思路:第一,以福山、多伊尔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美国人的威胁来自非自由民主国家,只要世界上不信仰自由民主理念的政权的存在,美国梦想就不可能实现,它们对美国安全的重大威胁。第二,以米尔斯海默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美国人的威胁来自不确定的国际格局,两极格局最利于国际稳定,可是冷战结束了,美国人昔日稳定的世界秩序再也没有了。米尔斯海默的“我们为什么很快会怀念冷战”^①军事霸权战略,希望美国回到过去,用昔日的冷战思维进一步加强军事霸权。第三,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一种类似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安全观念。他认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威胁在于非西方文明的兴起以及伊斯兰、儒教文化的可能联盟。文明的冲突是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模式,也是美国需要认真对待的安全问题。^②第四,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卡普兰等保守派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经济极化的矛盾问题,美国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亦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③第五,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认为,美国的威胁是由于大批国家不遵守全球化数字经济规则带来的,美国的利益在于美国是全球化及其规则化的代表,对这些规则的对抗就是对美国的威胁。^④第六种则是著名外交理论家基辛格博士的思路,他认为美国的危险不在于多边主义外交,而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一个不稳定的单极秩序和稳定的两极秩序都不是好的世界秩序,最好的世界秩序是类似于19世纪欧洲的多极均势秩序。^⑤对第一个问题,阿特教授接近于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美国的威胁来自于新兴强国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但他对于这一观点

①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③ 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94;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Random House, 2000).

④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r Tree*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⑤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的提出,却附带提出了另外也许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美国的危险在于大战略的模糊或者缺失。“美国迫切地需要制订一项清晰明确的大战略”,一是因为美国有条件这么做,二是因为美国力量优势再过几十年就会发生急剧消减。^① 过去的10年里美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大战略,但乘胜利之机、军力之威,以及新经济之强而信步天下,现在情况不同,要尽可能地保持冷战胜利的遗产,最主要的就是制定一项明晰的大战略,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总之,部分美国学者希望挟冷战胜利之威,继续巩固美国的全球地位、经济实力以及扩大民主化,为此采取一种积极的国际主义战略,甚至不惜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战略,而另外一些美国学者主张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战略,认为“美国卷入地区性冲突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军事介入增加了把美国卷入地区性战争的风险,而这些战争可能转化为核生化战争,并且被认为可能使美国本土处于危险之中。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核生化困境,美国应该收起它对其盟国的核保护伞,而不是将它继续扩展”^②。

“9·11”后,美国怎么办?威胁来了,这个威胁对美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如何应对威胁?美国要不要采取一种积极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还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恐战略——知难而退,从全球撤军,不再担负世界领袖的角色?虽然小布什政府采取了第一种战略,而且获得了战略界的多数支持,但是后一种观念也很有市场。^③ 这还涉及另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9·11”是否改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克劳斯墨、布鲁克斯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9·11”事件本身并没有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还巩固了美国

① 见本书第2页。

② Ted Galen Carpenter, “Closing the Nuclear Umbrella”,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March/April 1994), pp. 8—14.

③ 参见 Eric Nordlinger,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1 ff; 以及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 (Spring 2002), pp. 245—257.

的全球主导地位,事件是美国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美国时代”的契机。^①另一种观点以著名理论家沃勒斯坦和库普琛为代表,他们认为,冷战的胜利并不是福山等人所乐观认为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追求,很可能在顺利时加强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动或者受挫时推动美国走向孤立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9·11”事件没有改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反而加大了美国衰落趋势。这一事件的政治后果可能是,发展中的欧洲崛起与大西洋联盟的解体将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②

本书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中间路线,既不为“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地位沾沾自喜,也不灰心丧气。他从国际关系学与战略学的双重角度,理论联系历史,较有说服力地提出选择性干预战略,指出既不能像孤立主义与离岸平衡战略的战略家那样采取消极措施,又不能像小布什政府那样采取单边主义的反恐战略,强调美国与盟国的广泛军事合作,从而较为客观而正确地回答了“‘9·11’后,美国怎么办”这个对美国来说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9·11”事件之后,“未来对美国不会美好如昔。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越来越对美国的超强地位表示不满,并可能挑战它。因此,美国世界角色的成本就会攀升。2001年‘9·11’事件中,‘基地’组织发动的攻击提出了告诫,美国必须现在未雨绸缪”^③。而且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小布什政府未发动单边主义战争之时就似乎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美国的前途在于多边主义军事活动,因此愈益受到了战略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再度细读阿特教授关于美国未来的盛世箴言,字里行间总能品味出他对于后“9·11”时代世界大势与美国大战略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充满了对当前国际格局入木三分的认知,对国际关系理论娴熟自如的把握,对美国崛起历史了如指掌的理解。这种情况在美国国内是不多见的。

①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s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2/2003;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② 查尔斯·库普琛:《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见本书第3页。